

山西人民出版社

王德海所

主编○黃
副主编○銀
灿

总策划○李钢

李富盛
钢

郭永安

夷生蠻體身有

晋祠華嚴石經

趙様初題

卷之三

卷之三

分类号	26.32946
著者号	H925
登录号	33930

K877.43

石刻選

山西人民出版社

晋祠華嚴石經

趙様初題



主编○黃征
副主编○銀
总策划○李钢
宋富盛
李钢
郭永安
郭永安



1122/14 165



1998.7.9
文物出版社
读者服务部
No. 22419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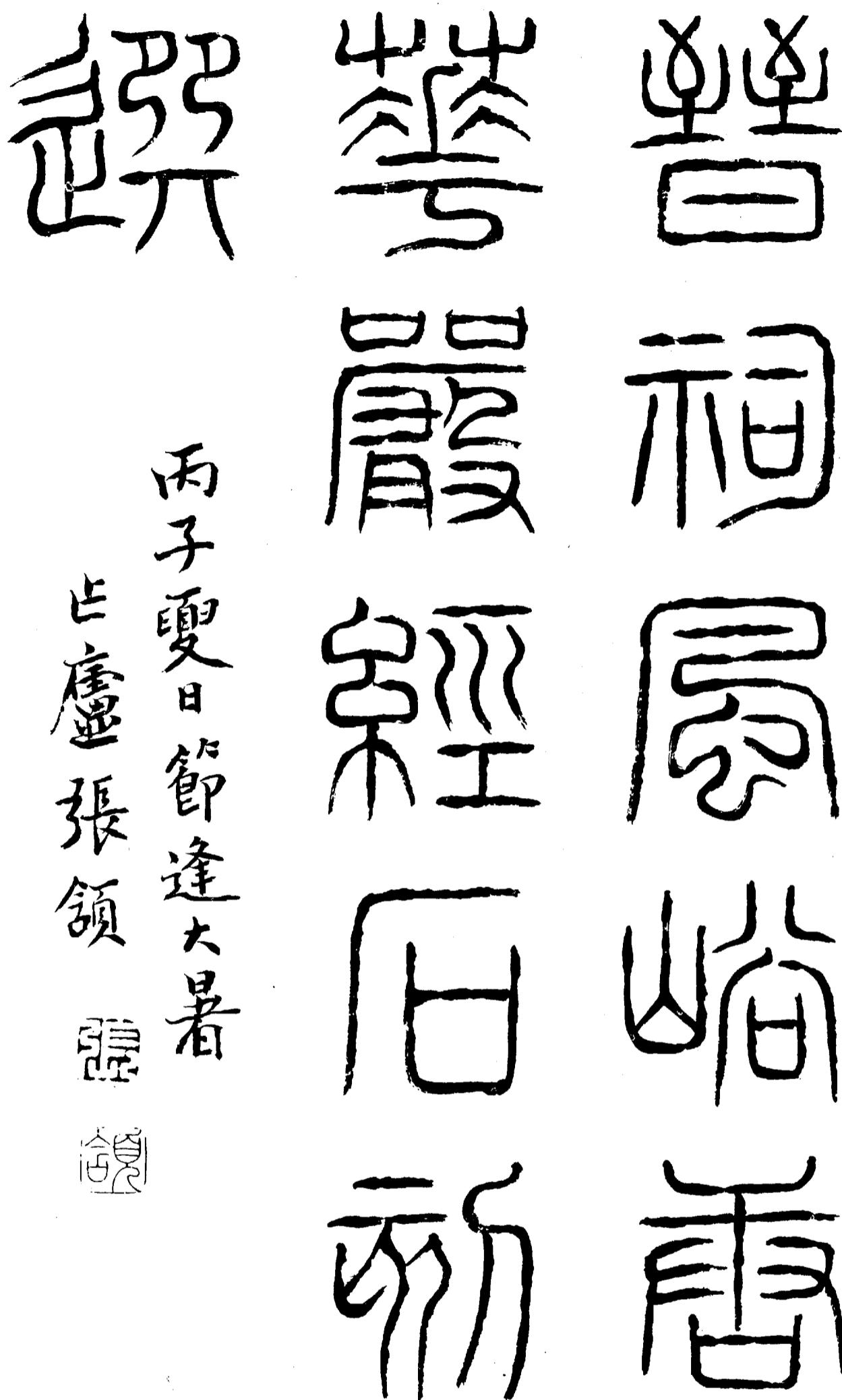
石刻選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并州北路六十九号)	主编 黄征 宋富盛
山西美术印刷厂印刷	副主编 银灿 李钢 郭永安
开本 880×1230—8开 印张 17	总策划 李钢
1996年10月第1版太原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赵国成 张福林 王小平
ISBN 7—203—03476—3/J·325	装帧设计 陈水平
印数 1—4000册 定价 伍拾元	

晋祠藏风峪华严石经

周绍良署





玄空右 佛乘原是宗
理事無礙 微妙圓通
利口易地 諸君風流
能教經石庵子比隆

元祐六年七月號真中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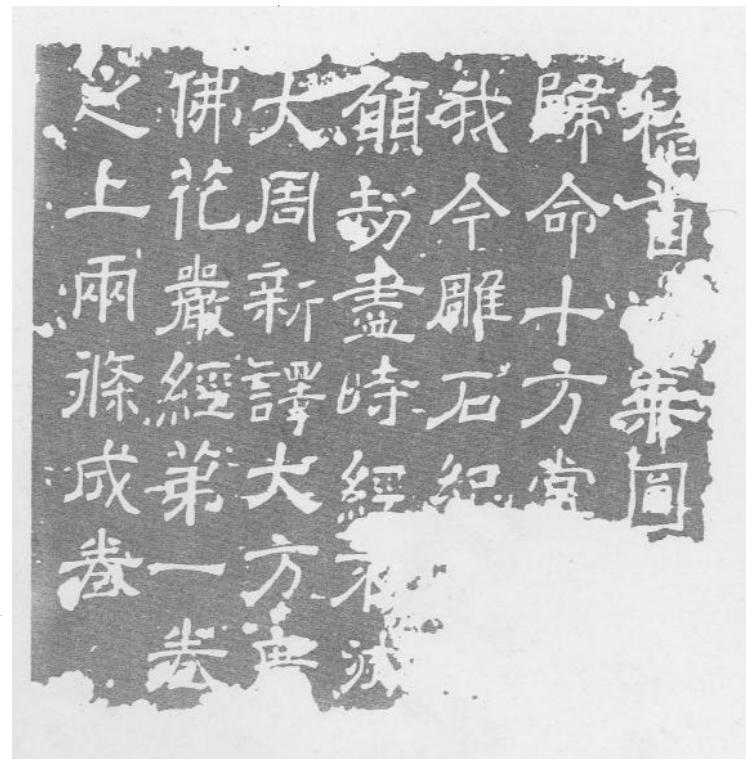
序

晋祠是一处自然风光与历史文物相交织的风景名胜之区。古为唐地，西周初年成王之弟叔虞封于唐，其子燮因境内有晋水而改唐为晋，后人祀叔虞于晋水之源，因称晋祠。自《山海经》始，历代均有文献记载，而魏、齐、隋、唐以下各代至今尚有大量的实物保留于祠内外。

斗转星移，光阴似箭。历经千余年风霜雪雨的《华严石经》虽屡遭兵火动乱，几度辗转，与清康熙初年学者朱彝尊入洞考察时统计的一百二十六块相较，不仅石经总数无多大丢失，还应了朱彝尊、王显祚先生联句：“二百二十六，石柱刻作经；会须抉风峪，移植水边亭。”的预言，落户于晋祠十方奉圣禅寺之内。是偶然也好，是巧合也罢，可它于晋祠却算的上是有缘了。

《晋祠华严石经》始刻于初唐武周后期，约公元七〇〇——七〇四年，则天女皇请于圆国高僧实叉难陀，在圣历二年（公元六九九年）译成八十卷《华严经》，亲自为之作序，并把它完整地镌刻于方形石柱之上。石经原藏于太原县城西风峪沟口的风洞内，抗日战争期间，险被日本侵略军劫运出境，幸赖当地人士设法抢救，才使劫运未逞，遂将石经迁入晋祠保存。石经历经千余年，虽有剥蚀残损，但其大多字迹苍古劲秀，仍清晰可见。石经溶佛学、史学、书法于一炉，是佛教文化中的珍品。

本书内容特点为三个方面：一是《华严石经》为传世八十卷《华严经》的石刻祖本，从书中所收部分影印片中可以领略石经的风采。二是《华严石经》中保留了大量风韵各异的唐人小楷，其中许多篇章堪与初唐四家——虞、欧、褚、薛相媲美，为碑刻和书法研究者、爱好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唐代石刻资料和范本。三是书中介绍了石经中武周新造字和有关题记，初步探讨了《华严石经》中涉及到的一些问题，以引起读者对《华严石经》加以深入了解、研究的兴趣。从上述内容来说，本书确是一本具有资料性、观赏性和学术性的优秀读物。



对于《华严石经》的整理研究，多年来，一因佛教经典浩如烟海，深奥晦涩；二因条件所限，大都望而却步。这次胡春英副馆长、王鸿宾先生和研究所、保管部几位同志同心协力，嗜古知新，如出硎新刃。经两年的努力，才使得《华严石经》整理工作有一些进展，大家深有：“入之愈深，其进愈难，其所见愈奇。”之感。

在各民族的历史上，宗教曾对民族精神、文化、科技、道德、风俗以及生活方式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相信随着《华严石经》的深入研究，其成果必将为世所重。同时《华严石经》也将成为晋祠与圣母殿、唐碑《晋祠铭》齐名的又一镇馆之宝。

通过对《华严石经》的整理和这次出版，我们不仅要使石经得到完善的保护，还要在进一步深入整理研究的基础上，继续编印石经集和石经论文集。



一九九六年夏于晋溪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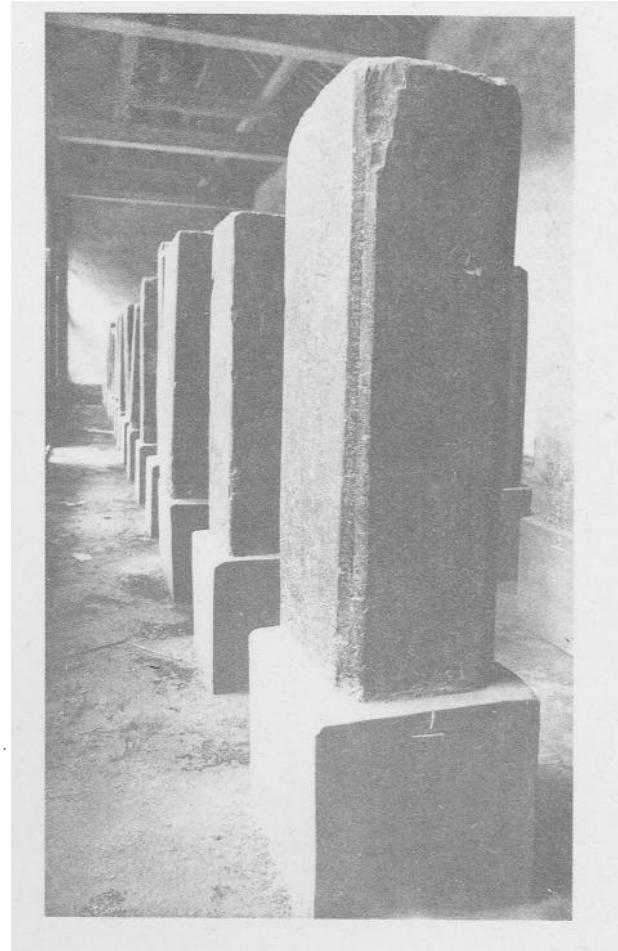
《晋祠华严石经》石刻纪略

唐代是我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无论在建宗立说、传译经论，还是重视佛教经典的长期保存与传播，镌刻各种造型的石经等諸多方面，都达到新的水平。《晋祠华严石经》正是这一时期中国佛教文化辉煌成就的实证。

《晋祠华严石经》是首尾完整地满镌唐译八十卷《华严经》的方柱形小楷石刻群。每卷分卷之上、卷之下二石。全部石经数应是一百六十通，连同补刻、复刻之石，应略多于此数。石经无盖、无座，无雕饰。上下一致，高低参差，宽窄不一。刻石大小一般以每卷字数多少而选定。多数为高一米以上的四面刻，也有少数五面、六面或八棱形石柱。现存少数刻石有武周新造字，全部石刻群为典型的唐人楷书。在少数刻石顶部或末尾有题记或题名。石经始刻于初唐武周则天女皇称帝晚期，比唐碑《晋祠铭》约晚半个世纪，是距今一千多年的唐代佛教文化遗珍。

《华严经》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内容繁富，义理弘深，是大乘佛教的著名经典，也是唐代华严宗建宗立说的主要经典依据，被誉为“诸经之王”。经义内容中包含的四法界、十玄门等华严思想，是构成华严宗哲理、学说的核心。这部佛经对中国哲学特别是对宋明理学，对禅宗等大乘佛教宗派和秘密佛教，以及对日本、朝鲜等地华严宗的形成和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华严经》先后有两种完整的汉译本。一种是东晋末年至南朝宋初（公元四一八—四二一年）以南天竺三藏佛驮跋陀罗为主译僧，在扬州所译的六十卷本，略称《六十华严》，或称晋本。一种是时隔二百七十多年后，扬佛抑道的则天女皇嫌《六十华严》译意未周。她说：“圆一部之典，才获三万余言，唯启半珠，未获全宝”。于是遣使到西域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县一带）迎梵本，请于阗国三藏沙门实叉难陀为主译僧，组成了中外高僧大德与武周官员相结合的译经班子，于证圣元年三月至圣历二年十月（公元六九五—六九九年），在神都洛阳译成八十卷《华严经》。略称《八十华严》，



或称唐本。则天女皇为亲自关注下译成的《八十华严》，作了序。在此前后还出现许多《华严》品目的单行译本。石经卷第一之上、残石左面，至今仍保留女皇《大方广佛华严经序》的残迹。依据顶部题记及经文中有关武周新造字等特点，石经始刻于圣历三年至长安四年（公元七〇〇——七〇四年）女皇驾崩前的武周晚期。即神都洛阳刚译毕，便在北都晋阳开始镌刻。

据明《永乐大典》转引《元一统志》载，最晚至元代，石经已在晋阳古城西三里许的风峪口，专设石经藏院予以保存，明确记载这里所藏的为『唐人所书《华严石经》』。以经定名，这部石经略称《华严石经》。至明代中叶，藏院塌毁，只留地上已坏的几间亭屋和地下的约五丈见方的一『砖甃洞』，即风洞。石经虽仍藏风洞内，却已鲜为人知。直至清康熙五年（公元一六六六年），学者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秀水即今浙江嘉兴人，著《曝书亭集》）入洞考察时，发现风洞内藏此石经共一百二十六通。朱氏撰《风峪石刻佛经记》等诗文叙述，并主张移置晋祠保存。至此，清代以来的地方史志及金石典籍，如王昶《金石萃编》等始有著录。石经拓片也开始流传。但由于朱氏《燎薪以入》洞，石经『惜皆掩其三面，未纵观其全』，因而误断为北齐天保（公元五五〇——五五九年）间字。其后金石诸家也多从其说。

元代石经藏院地点也就是明清以来的太原县（县城在今太原市南郊区晋源镇）风洞，在现晋源镇乱石滩晋源果树场果窖处。东距晋源镇约二公里，西距风峪口约一公里，南偏西距晋祠约五公里。风峪自古为晋阳西行要径，史载有名。峪内多塔寺佛迹，曾香火兴旺。隋炀帝驾幸娄烦行宫，即从风峪取道西行。石经既置风峪之口，所以清代至今，对此石经的命名多冠以『风峪』二字。因而『风峪石经』也是这部石经的略称。风峪常多风成灾，民众渴望风调雨顺，所以石经藏院设置于此，也有『风峪每有暴风，因以石藏镇之』的愿望。明清以来，还有每年三月初三，地方官绅来此祭祀，『否则多风』的惯例。因此，当地人们对古老的风洞及这部石经倍感神秘和尊重，视为地方珍贵文物。康熙间，风洞顶部添设祠屋。道光间，更增建修缮，成为南北向两进祠院。前院以座北砖木结构的

风洞祠为主。后院在风洞祠背后高起的后院基上，以座北窑洞式风神祠为主。祠内所供女风神为神话传说中的封十八姨，俗称封姨，花精所变。此祠古朴厚实，为清代前遗物。风洞在高起的后院基之下，内径约九米见方，洞壁砌砖宽大，洞顶用绳纹砖斗合叠涩成穹窿形。洞中央设石制方形中心柱直撑洞顶。石雕坐佛一尊，背依中心柱，面南正对风洞口。风洞口高于洞底，上下有踏步。洞门在前祠院风洞祠北壁，对外封闭，进出风洞必经此祠内。洞顶四角有通风口各一，直穿洞上后祠院。洞内西壁尚有一小洞穴，多有关风的传说。石经即环立于洞壁及中心柱周围。

综上所述，清道光以来的太原县风洞是大致依元明时期石经藏院遗制，为一处地上祠院与地下洞室上下重叠，以祠院掩护风洞，小型、别致的古老建筑。此处既祭祀风神，又尊奉佛陀，释道共处。元代此处已有石经藏院，这是有据可证的。至于从风洞的绳纹砖穹窿顶、石制中心柱等结构特点分析，风洞应是千年以上唐代古建。石经也很可能在唐代已妥善安置于此。五代十国战乱，风洞有所干扰，石经也有补刻或复刻，如现存卷第十一之上，共二石。其中有题记的一石，就是五代时北汉天会四年复刻的。以上分析判断可供深入探讨者参考。

抗日战争前的数百年间，风洞地上祠院建而复毁，满目凄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学者已在风洞附近的风峪、天龙山等处非法考察晋阳古迹。日本人常盘大定曾查访风洞而未能找到。一九三三年，在外国盗窃分子剖割天龙山石佛的同时，风洞内的坐佛头也被盗走。虽然如此，抗战前夕，在残破的山门上仍贴着「古庙无灯明月照 禅院有尘清风扫」的对联，地下洞室及环立其间的《华严石经》始终并无大的干扰。只是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占领太原县的日本侵略军才对这部石经及风洞进行了空前的洗劫和破坏。一九四〇年秋，日本侵略军将大部分石经挖出洞外，草袋包裹，准备劫运。在当地有关人士努力下，利用合法身份，虎口夺食，奋力交涉。日本侵略军也因惧怕民众群起反抗，酿成事端，才被迫放弃劫运计划。劫运既已罢休，有关人士遂将已挖出洞的全部石经迁入晋祠庙内部保存。至一九四二年，日本侵略军更将风洞上下纵火陷顶，彻底捣毁，从而结

束了石经和风洞长期依存的密切关系。迁入晋祠的虽有安身之处，但已塌陷的风洞内仍掩埋着许多石经。在解放战争时期，这些石经继续遭到厄运。一九四七年，驻太原县阎锡山军队为对抗解放军，将残存的部分石经作修筑碉堡之用。也是在当地群众尽力保护下，才使这些石经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千余年来石经遭到的最大破坏，莫过于日本侵略军的洗劫。

新中国的成立才给饱经沧桑的这一石刻文物带来复苏。五六十年代，在风洞旧址和晋源阎军旧碉堡等处，发现并迁归晋祠零散《华严石经》约二十余通。直至今年，还在晋源镇以西太汾公路东侧，一座阎军碉堡残骸上，先后发现、迁归数块《华严》残石。所有这些石经的回归，大多数都是群众发现后自觉报告的。足见群众对此文物的爱护。一九五二年，山西晋祠古迹保养所对《华严石经》开展了比较全面的整理工作。通过这次整理，首先是逐一与《华严》经本相对校，编排石经次序，公开陈列于晋祠唐叔虞祠，使长期封闭的千年文物开始公诸于世。二是在系统核校全部石经基础上，判定此石刻确系初唐武周时所刻唐译《八十华严》。从而纠正了长期以来刻石年代上的误断，证明《元一统志》、清《寰宇访碑录》的著录属实无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初，石经因故再度封存。一九八二年，太原市晋祠文物保管所在晋祠十方奉圣禅寺专建碑廊，重新陈列。自抗日战争以来，石经迁入晋祠，已逾半个多世纪之久，不仅妥善珍藏，而且陆续回归。现存石经总数，整石加残石（同一石经的两块以上残石以一石计）共一百三十余通。连同至今仍掩埋在风洞遗址下的和阎军碉堡使用的石经，抗日战争前，石经至少应有一百四十多通。这部石经虽累遭兵火，几度搬迁，但石经总数与清初仍相接近。与原刻总数相较，也还保存约百分之八十。而且其中尚有许多基本平整完好、字迹清晰无损的石经。虽伤痕斑斑，仍得窥全豹。

《晋祠华严石经》是唐译《八十华严》传世最古老的石刻祖本，遗留着译成之初的原始痕迹。《八十华严》由《六十华严》的七处八会（指释迦牟尼佛在七个处所，主持了八次法会）、三十四品、六十卷发展为七处九会、三十九品、八十卷。不仅品卷内容有所增益，在文义和翻译水平等方面也

都胜于晋本。是后世流传最广、影响较大的《华严》经本。这部石经对校勘后世诸多《华严》版本，研究华严宗及其经论都有重要意义。以石经卷第二之下为例，与以下三种《八十华严》相应品卷互校：一、《中华大藏经》，二、《碛砂大藏经》，三、南京市金陵刻经处木刻线装本《八十华严》，如石经后面第十三行「此是得天方便力」的「得」字，以上三本均为「德」。石经中有的重要题记也是研究隋唐佛教史的珍贵资料。

《晋祠华严石经》中的武周新造字等，也是研究古代文字演变的重要资料。首先，武周新造字的字数典籍记载互有出入。《新唐书》、《资治通鉴》均说为十二字。《通鉴注》、郑樵《通志》、《宣和书谱》分别为十四、十六、十九字。从武周石刻所见，实际上也并无十九字。而《华严石经》制作于女皇衰老的武周晚期，造字已告一段落。在现存石经中除少数避讳等字未见外，大部分武周字都已收入，是武周所造字比较齐全的汇集。其次是多数武周字的字形笔画不仅与典籍记载不同，与武周石刻相较，也互有差异。如「月」字见于以上典籍的就有「㊣」、「𠂔」、「𠂎」、「𢃥」等不同。石经及长安二年（公元七〇二年）《顺陵碑》等此字却为「𠂔」。从武周所造十二字开始启用，就是在紧锣密鼓地废唐建周的载初元年（公元六八九年）这一关键时刻，说明武周造字有强烈的政治内涵。武周字的出现常与女皇建制改元有关，并非按文字演变的自身规律所形成。因此，虽然有一字可能出现两种以上的不同写法，但武周造字重在其义，字字有本，决非「草创无义」，任意书写。只因典籍记载均为宋人著录，难免传摹失真。原始依据当推武周石刻存字，而石刻制作也有精粗之别。石经所存武周字不仅字数较全，而且字形笔画也较为准确有据。如武周「聖」字在《通志》、《通鉴注》、《书谱》中分别为「𠂔」、「𠂔」、「𢃥」，而《华严石经》却为「𠂔」，与《顺陵碑》中的「𠂔」、圣历二年《升仙太子碑》中的「𠂔」，以及《房山石经》中武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碑》碑额题记内的「𠂔」都相似。这与宋赵与时《宾退录》所说：武后改易新字，如「长正主为圣」相合。武周「正」字为「𠂔」，以上三碑「聖」字中的「正」字分别为「𠂔」、「𠂔」、「𠂔」，均有小异。至于《通

志》等典籍中所书「聖」字，更有商榷的必要。武周造字虽为数不多，「独能行于一世而止」，但它对了解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和政治变革都有关系。此外，石经中的古体、异体、缺笔避讳等字，也是研究古代文字演变的重要资料。

《晋祠华严石经》的石刻书迹是古代书法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篇章。《华严石经》中保存了大批字径约二厘米左右的小楷书作。虽少数篇章缺乏安排，失之朴俗，镌刻也未必尽如人意。但多数篇章结构严谨，风格多彩，有浓郁的初唐书法神韵。这部石经除小楷外，还有少数隶书刻石。有一石之中隶楷并存，但更多的是在大量精美的楷书字迹中掺以许多隶、魏笔意，表现了形成唐代书风之初的过度痕迹。石经中有些楷书篇章笔圆体方，外柔内刚，颇有虞（世南）书神韵。许多篇章方整稳健，用笔舒展遒劲，颇有欧（欧阳询）、褚（遂良）风骨，而无拘谨和火气。初唐书家多博采南北之长，而独追右军（王羲之）神韵。石经有些篇章的行气、结体稳穆含蓄，顿提使转，藏露有致，颇有小楷《乐毅论》、行书《兰亭序》等右军笔意。有些小楷字迹雄强深厚，刚劲有力，竖画有向内折钗之势，为后来颜（真卿）体的法乳。还有许多端严古朴，笔力遒劲的书作。《华严石经》的小楷书作与《房山石经》风韵不同。《房山石经》从隋至明，纵贯千余年，许多写经高手为之书丹，所有字迹方整圆腴，写刻双绝，风格也基本相似，如出一人之手，令人叹为观止。而《华严石经》止于唐代，石仅百余，只此一部，却呈现出许多不同风韵的精美书作，同样令人叹为观止。从书法艺术范畴来说，《华严石经》宛如一部唐代小楷范帖，是唐代精美小楷的荟萃，是三晋古代书法艺术宝库中的重要遗存。

《晋祠华严石经》以其古穆、浑重而挺拔的姿态，悄然耸立在太原市晋祠博物馆。这一佛教文化遗珍必然越来越为世所重。

在本文撰写中承蒙陈扬炯、师道刚、王天麻三位先生指导帮助，谨致谢意。

王鸿宾

一九九六年夏月于晋祠

目 录

封面、扉页题字	赵朴初
题字	周绍良
题诗	姚奠中
序	李钢
《晋祠华严石经》石刻纪略	王鸿宾
武则天华严经序	(一)
卷二之下 前、后	(三)
卷二之下 左、右	(四)
武则天造字	(五)
卷二之下 前	(六)
卷二之下 前	(七)
卷二之下 右	(八)
卷二之下 右	(九)
卷三之上 前	(一〇)
卷三之上 前	(一一)
卷三之上 左	(一二)
卷三之上 左	(一三)
卷三之上 后	(一四)
卷三之上 后	(一五)
卷四之下 后	(一六)
卷四之下 后	(一七)
卷四之下 前	(一八)
卷四之下 前	(一九)
卷五之下 前	(一〇)
卷五之下 前	(一一)
卷五之下 左	(一二)
卷五之下 左	(一三)
卷六之下 后	(一四)

卷二十之上
卷二十二之上
卷二十二之上
卷二十二之上
卷二十三之上
卷二十三之上
卷二十三之上
卷二十五之下
卷二十五之下
卷二十五之下
卷二十七之上
卷二十七之上
卷二十七之上
卷二十七之上
卷二十八之上
卷二十八之上
卷二十八之上
卷二十九之下
卷二十九之下
卷三十之下
卷三十之下
卷三十二之上
卷三十二之上
卷三十三之上
卷三十三之上
卷三十三之上

卷首上北前残石
自命令步盡雕十方來
當紀經大夫第經譯時口方來
雨嚴新盡雕十方來
上花周步盡雕十方來
耕天顯我求天子
卷一 方廣源